

● 书 评

全新的视角 全新的体系

——《旅游文化学》评介

丁 川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丁川(1977-),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史、史学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 K928.9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5-0638-02

旅游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发生的影响或许比单纯的经济影响更为深远。最近,由谢贵安等编著的《旅游文化学》一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相关成果的同时,又以一种深邃的文化眼光剖析了旅游文化,形成新颖独到的理论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构筑起一个全新的旅游文化体系。

(一)谢贵安多年来致力于文化史的研究,并将这种研究延伸到旅游文化方面,撰成了这部具有独特文化观照视角的《旅游文化学》,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界定旅游、旅游文化乃至旅游主体,并对旅游活动做了更深的阐释。

作者由对文化的核心做“人化”、“人文化”这一理解入手,进而对旅游文化的本质加以界定,指出“旅游文化的本质取决于人的本质属性”。这就找到了旅游活动得以产生、发展的深层次的根源。人具有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性完善的本质特性,人类超越自然、追求自由和完善的本质属性,使其天生具有“出走”的动机和“超越”的愿望,从而导致了旅游活动的产生。人类在追求自由的旅游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作者在结束语中所勾勒的“从超越自然到回归自然”的旅游文化步履。第一阶段是人类利用群体力量来征服自然并发展社会,第二阶段是人类通过个体解放来超越社会,回归自然。这是一个哲学意义上走向自由的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同时,人类追求自由和完善自身的本质属性,也体现在文化空间的横向跨越上,即人类对原有文化环境的出走和超越,对异质文化的体验和比较。由此得出结论:“旅游文化的本质,是旅游主体在客体和中介体的参与下的‘人文化成’过程和结果,也即摆脱人的自然属性,发展文化人格并追求人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过程及其成果。”这样的定义深刻地揭示了旅游文化的本质,突出了“人”这个旅游活动中的核心环节,确为一个精辟的诠释。

以往有关旅游主体的界定往往只是对旅游主体做外在的表层勾勒,仅从时间和空间上对旅游主体进行把握。而在旅游文化学中,作者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剖析,指出旅游主体是“旅游文化的负载者和传播者”,其负载着原有的文化内涵,前往相异的文化空间去旅行和游览,在将原有文化传播到异地的同时,也将异地的文化传播回原有的文化环境之中,旅游主体在旅游过程中,在对文化差异的比较及文化交流的追求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素质,实现对真善美的认同。作者通过文化眼光的透视,将文化理论渗透和贯穿于全书之中,使旅游和文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旅游文化学理论显得日益成熟、丰满。

(二)旅游学与文化理论的紧密结合,也产生了另一个质的飞跃,即一个全新的旅游文化学体系的构筑和定型,全书高度统一、系统有机的结构即是最好的体现。

旅游文化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同时涉及文化学、旅游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管理学,并扩展到心理学、美学、哲学等领域,是一门边缘和交叉学科,这就决定了旅游文化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由于一些旅游学著作在建立无所不包的体系的同时,缺乏一种总体上的统摄能力,使得其主线不明确,重点不突出,且其中的许多内容也

与现有的旅游科目严重重复,使旅游文化学体系支离破碎,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

谢贵在《旅游文化学》中另辟蹊径,凭借着多年从事文化史研究的敏感,以一种深邃的文化眼光剖析旅游文化,深刻地把握了旅游文化的本质内涵,从而构筑起一个全新的旅游文化学体系。对于这个体系,作者没有做类似于观念、制度、物质层面的静态划分,而是将其看做由旅游主体、客体、中介体及社会环境等几个环节构成的一个动态的线性结构。作者认为,若将旅游文化体系做若干构成要素的静态划分,则会使各个部分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其消解的命运是无法避免的。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找到旅游文化诸事项中的主要环节,没有找到构筑旅游文化体系的切入点。要解决这一点,就必须具备独到的观察视角,即借助于文化理论去探寻这个切入点。在文化中,人是核心主体。作者由此导出,旅游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人,也即是旅游主体。旅游文化是“由旅游者在运动中形成的一系列文化事项及其联系”。故而,旅游文化的体系,便是由旅游出发地社会文化环境——旅游主体——旅游中介体——旅游客体——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环境各个环节,所构成的连续的旅游过程及完整的社会文化聚合。在旅游主体运动之前,各种文化现象虽然早已存在,但均与旅游无关,而只有通过旅游主体的活动,各种相关的文化现象才会迭相发生,不同的文化现象才构成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形成一种文化系统”。作者正是在纷繁复杂的旅游文化事项中,抓住了旅游主体这个核心环节,并以此将旅游客体、中介体、社会文化环境各个环节紧密联系起来,着力研究旅游主体的“人文化成”过程,即研究旅游主体在旅游客体和旅游中介体的参与下,文化人格和民族旅游性格的塑造过程,才使旅游文化学不成为散乱的拼盘,而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由于切入点的正确把握,使诸多旅游文化现象得以有效地统摄,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从而构筑起一个较为成熟的旅游文化体系。

(三)旅游业的产生、兴起虽然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作为人类本质属性反映的旅游活动却源远流长,几乎与人类社会同龄。我们惟有穿过重重的时间迷雾,对旅游活动做探根寻源式的历史考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旅游及旅游文化的本质内涵,并对现代旅游业做出有益的指导。有鉴于此,《旅游文化学》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并将其有机地融入全书的体系之中。更为难得的是,全书具有一种恢宏宽广的历史观照视野,在史料的安排上,能够中西兼顾,比照并叙。

该书第二章旅游文化源流,就是论述古今中外旅游活动发展历史的专篇。作者从旅游文化的起源谈起,将中国旅游文化的源头追溯至先秦,指出帝王巡游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劳做性旅游现象,而孔子等人的旅游活动则为文人、士大夫树立了“仁山智水”的典范。与此同时,在西方,濒临地中海的古埃及、腓尼基及古希腊、古罗马的探险旅游活动更是兴盛不衰。作者两相比较,指出上古时期,中西旅游文化系统分别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发生成型,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两大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旅游文化体系。中国的旅游文化重在向内修身和怡情,以向善审美为目的,而西方旅游文化因其产生于濒海环境,更侧重于向外探求和征服,并以求真逐利为宗旨。在“旅游文化的突变与扩展”一节中,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阶段旅游活动发生的一些变化,即“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观,商人市民的旅游迅速崛起,成为这一时代的旅游表征”。商人市民旅游的迅猛发展,为传统旅游注入了一些新的活跃成分。正是在这一氛围的熏陶下,产生了徐霞客这样著名的平民旅行家。在陆路旅游大踏步前进的同时或稍前,中国的航海旅游也掀起了高潮。以“宣威海外”为目的,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行程之远和发生之早都是当时的欧洲所无法企及的。但由于中国传统的保守内敛旅游性格的影响,这次航海壮举在达到空前盛况的同时,也成为绝后的遗憾。紧接中国人之后进军海洋的是西方的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航海伟业,一浪接一浪地进行着,最终实现了世界文化圈的联结。全球格局一体化形成后,“旅游文化的交流和整合”便成为叙述的主流。这一时期,西方文化不断向东扩散,尤其是近代以来,外国商人、传教士纷纷来华,其民族外向和扩张的旅游性格,对内敛自持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中国的旅游文化也进行着缓慢、柔弱地西渐,使西方民族旅游性格除了冒险勇进、征服扩张外,还融入了亲近自然、温柔多情的特点。最后作者颇具深意地指出:各民族旅游文化的整合“不是统一到以西方或其他什么民族为模式的单一旅游文化之中,而是按照‘和而不同’的整合方式”从自己原有的立场出发,去统摄其他民族的旅游文化因子,形成“既能适应各国具体情况又具有世界普泛性的富有弹性的新的旅游文化”。

除此之外,散见于各章节中叙论结合的例子,也不一而足。如谈到旅游文化制度时,便追溯至古代,并引经据典,以《周礼》为证,指出中国很早就设立了管理旅游的机构,而且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和法规。

《旅游文化学》一书所特有的文化剖析视角、高度统一的有机结构及恢宏的历史观照视野,体现了旅游文化学研究的巨大进步,使旅游文化学学科体系更趋成熟、丰满。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藪,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文化学对旅游活动及文化规律的深入探索,无疑对推动当代旅游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